

□ 碟碟不休

罗生门效应

■ 韩连庆

【例如,到底是谁刺杀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以美国政府的实力,想弄清楚这点事情其实很容易,但问题的关键是想不想弄清楚,知道真相是否一定比不知道真相要好。】

我有位朋友在大学里当哲学老师,每次在上“哲学导论”之类的课程时,总是先给学生看一遍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由此导入对“真理的本质”之类的知识论问题的讨论。在电影中,被害的武士、武士的妻子、强盗多襄丸和旁观者樵夫对同一起杀人事件提供了四种完全不同的叙述,出于本能和常识,我们自然想知道到底哪一种叙述才是真的。像这样的案件最好由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来侦破,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通过与所有当事人对话,发现矛盾,确定凶手。

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罗生门》无疑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多襄丸说他是用长刀杀死武士的,武士的妻子说她是用短刀杀死丈夫的,而武士说他是用短刀自杀的,那么起码可以通过验尸来确定武士到底是怎么死的,从而澄清真相。所以,《罗生门》的主旨并不是讲一个侦探故事。从哲学上来说,《罗生门》的重点并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故事的形式。

理论家们在评论《罗生门》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电影提供了四种看待现实的主观视角,每种视角下的叙述都能自圆其说,但这些叙述又相互冲突。由此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用语Rashomon Effect(“罗生门效应”)。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真相/真理是什么?”

【笔墨境界之高低,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也左右着艺术审美。】

人类文明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不断创制工具、发现与应用载体的历史。科学探索如此,文艺创作亦然。

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文艺创作面临不少挑战,最为突出的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从认知与实践论观点看,找到上质量、攀高峰的“载体”与“工具”,并创制应之,是获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以绘画艺术言,笔墨是绘画的基本元素,也是构成画面的核心要素。笔墨境界之高低,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也左右着艺术审美。

如何令笔墨进入清新、高格、纯净、融合、朴真与灵动?从笔墨的生发与演变发展中,似可寻出端倪。

从绘画艺术史观,笔墨发展演变迄今经历了线墨、意墨、泼墨几个阶段:线墨就是工描之墨,与求形状貌相牵;意墨就是意象之墨,与寄情寓意相契;泼墨就是抽象之墨,与挥洒心绪相和。“三墨”之后,或由“三墨”交互融合、延伸出现的,是“三墨”合一。在承载艺术新象中,这种“三墨合一”之墨,突破既往笔墨诸法与技巧限制,追求笔墨浑朴天成之趣,呈现朴茂之境,表达朴拙之美,意为“朴墨”。最终笔墨将由泼墨、朴墨进入气墨,这是迄今可以预见的笔墨发展的最高形式。

按笔墨载象论,笔墨之变所带来的就是艺术之象的改变,线墨所承载的是具象艺术,意墨所承载的是意象艺术,泼墨、朴墨所承载的分别是抽象艺术与真象艺术。那么,气墨所承载的就是灵象艺术。

气墨,是一种怎样的笔墨?

“气”之原字始自甲骨文,“气”为宇宙元气,亦为人之精气。“墨”从黑从土,仓颉会意造字,古来唯指黑色颜料。

气为天地人本之源,气之交感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墨为色相之本,呈万变之象。气墨,既为气墨合一,也为笔墨之态;既为笔墨演变发展的最高级阶段,亦呈现艺术大美的载体。总言之,从线墨到气墨,灵象可望“现身”,从具象到灵象,笔墨实现至精。

显然,气墨浸润诗性精神、天地情怀与宇宙境界。从墨象上说,与灵象艺术相融合;从墨象上看,如梦似幻、深邃玄妙,进入笔墨的气境情态;从墨境上言,超越自然、功利、道德层面的经验审美,进入超验意义上的至高境界。换言之,气墨具有至精至纯、通天彻地、寂静天籁、灵动玄妙的仪态与品格,这些仪态与品格是独特的、唯一的,是笔与墨、天与人、技与艺等诸元素,均入“气”境而至天人合一的笔墨境界。

笔墨在其演变发展中,因经政、社科、哲学、人文、审美等多种因素影响,制约与合力作用,在时空、地域、幅员与呈现、构成、传承等方面或有异同甚至迥异,并呈阶段性、渐进性、反复性与交融性,表现出传承与发展、往复与并置、交互与融合等现象与特征,探研性与创造性地呈现出多种形式的排列与组合。但从认知、审美上,从艺术文明之大势所趋上,前行坦使命,目标是高峰,回头必倒退,停滞无未来。换言之,笔墨走向气墨,是艺术审美之期待,也是灵象艺术之“归宿”,更是从艺者的使命担当。

如气化墨,方能载灵承象。载体“盛”象论——绘画艺术是这样,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如此。

要有深刻的思辨和生活体验才能达到与庄

(What is truth?)

在我访学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哲学系,一位老师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贴了张摘自《纽约时报》的“座右铭”——

The truth is hard.(真理很硬。)
The truth is hidden.(真理藏而不露。)
The truth must be pursued.(追随真理。)
The truth is hard to hear.(真理逆耳。)
The truth is rarely simple.(真理绝非易事。)
The truth is rarely obvious.(真理难显。)
The truth doesn't take sides.(真理不偏不倚。)
The truth isn't red or blue(真理不是红色或绿色。)
The truth is necessary.(真理是必需的。)
The truth can't be glossed over.(无法掩饰真理。)
The truth has no agenda.(真理没有议程。)
The truth is hard to accept.(很难接受真理。)
The truth pulls no punches.(真理不留情面。)
The truth is worth defending.(真理值得捍卫。)
The truth requires taking a stand.(真理要表明立场。)
The truth is more important now than ever.(真理在此刻更重要。)

我对此的回应是:这只讲了真理的外延,没讲真理的内涵——What is truth?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超善恶》中提出过两种知识论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真相是危险的、致命的,因而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人们宁肯选择回避真相或者对真相视而不见。例如,到底是谁刺杀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以美国政府的实力,想弄清楚这点事情其实很容易,但问题的关键是想不想弄清

楚,知道真相是否一定比不知道真相要好。另一种立场则认为,根本没有真相,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表象,“真相”也就成了“表象”的“后现代”游戏。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认为,为了摆脱这两种立场的恶性循环,我们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寻找唯一的“真相”转移到各种不同的叙述或者表象之间的对抗上来。换句话说,真相是存在的,但是真相所在的位置并不是“事物本身实际上所是的样子”,而是不同视角之间的裂缝(gap),正是这一裂缝导致不同视角之间是不可通约的。

这种焦点的转移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例如,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人”认为“想”就是用思维器官进行思维活动,“说”就是把思维的内容传达给同类,因此“想”和“说”是同义词。但在人类看来,这恰恰表明“想”和“说”不是同义词。“三体人”和人类在思维和交流方面差异并不大,唯一的区别是“三体人”的脑电波更强,能直接被同类接受,所以省去了交流器官。“三体人”的交流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有欺骗和撒谎,也不知道什么是计谋和伪装,更不可能进行复杂的战略思维。“三体人”认为人类的交流器官是一种进化的缺陷和劣势,是对人类无法产生更强脑电波的补偿,而他们直接显示思维是更有效率的交流方式。但是人类却认为,“三体人”所认为的缺陷和劣势恰恰是人类的长处和优势,从而使得“三体人”无法识别人类的诡谲计谋。这也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著名论断:起初看似是障碍的东西,其实却是自身存在的积极条件。正是“想”与“说”、“说”与“做”、“知”与“行”之间的裂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 爱乐者说

【在18世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开了“作曲家自己写自己”的先例。】

音乐有各种样式。咏唱的,演奏的,独吟的,众和的,等等。这些样式皆在抒发情感或刻画意境。但,音乐也常像一个人一样,以音符叙说心曲。诸多样式之中最擅叙说的,莫过于“弦乐四重奏”了。

说到“弦乐”,法国作家斯丹达尔形象地把弦乐家比喻为四人对话:“第一小提琴像是一位中年的健谈人,他总找话题来维持着谈话。第二小提琴是第一小提琴的朋友,他竭力强调第一小提琴的话中机智,却很少表白自己;参加谈话时,只支持别人的意见而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大提琴是一位持重的人,有学问而好讲道理,他用简单而中肯的论断,支持第一小提琴的意见。至于中提琴,则是一位善良而有些饶舌的妇人,她讲不出重要的意见,但却经常插嘴。”

几近人声的弦乐四重奏,多以叙说的语气,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人,往往就是作曲家自己。弦乐四重奏是作曲家人生的不同时段,却常用于他们的晚岁时分。

18世纪的贝多芬,一生致力于大型交响音乐的创造。九部交响曲犹若九大建筑,构筑了他的人生旅程。而立之年,他开始接触弦乐四重奏。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刚刚学会恰如其分地谱写四重奏。”这时,他已创作了交响曲、协奏曲等多部大型作品。他一生只写了17首弦乐四重奏,其中经典之作,多写在他失聪的晚年。那时,他封闭的心境中涌出了自省性的“个人叙说”的愿望。

在这几部四重奏中,贝多芬以深沉的声调、平和的絮语,或是激动的申言,叙说着自己的人生。不同于他鸿篇巨制的交响曲,在四把弦乐的16根琴弦上,不再有贝多芬式的恢弘气势和尖锐冲突,他只是用流动的语韵在说话,在作温煦的娓娓叙说。因此,有人谓之这是乐圣用音符在作人生的回忆。在18世纪,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开了“作曲家自己写自己”的先例。

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音乐斑斓陆离。音乐展现了大千世界的丰富,文化秘境的深邃,以及个人情感的多彩。那种静态的深省的内心独白,特别是启用弦乐四重奏这个带有古典质朴色彩的音乐样式,却为数不多。

一位和贝多芬一样耳聋的捷克音乐家斯美塔那,在失聪的最后8年中,他写出了以“我的祖国”“我的生活”“我的家园”为题的三部经典之作。其中,最富个性的“我的生活”,就是《e小调弦乐四重奏》。传记作家库

尔特·霍诺尔卡写到,“这部自白性作品”,“在不同寻常的主题下展示了个人千丝万缕的情思,斯美塔那讲述了他个人的生活片段”;因为,坎坷的生活“常常使他比以前更爱回首往事”。

到了20世纪,从巴托克到肖斯塔科维奇,无一例外地在他们交响性戏剧性的“大作”之外,精致的弦乐四重奏就是他们的“音乐独白”和“音乐日记”,就是他们音乐的“个人叙说”。

斯蒂芬·瓦尔什在《巴托克室内乐》一书中指出:“他似乎是在带着反思的精神写弦乐四重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音乐会演奏节目而写。”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创作了15部交响曲,几乎同步,他又写了15首弦乐四重奏。

可以理解,交响曲是他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思考和诘问,四重奏则是对于自己人生的直白的叙说与自省。在他逝世前夕写作的《第14弦乐四重奏》,是“追怀逝去的欢乐”;而《第15弦乐四重奏》的七个乐章,有着“令人脊背发冷的戏剧性”,无疑,这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音乐家”整个一生的际遇的叙说。

弦乐四重奏看似简单,事实上,这些作品却往往技巧艰深。对于聆听者,那些“四重奏曲,也是刚一接触时最难欣赏的”。因为,这种只服从于内心的音乐叙说,音调未必优美,结构未必规整,技巧未必简洁。于是,在作曲家那里,它们是“思想集中和冷酷严峻,拒绝了美或放纵情感”;在聆听者那里,则“如果有人坚持音乐首先必须是悦耳动听,那他就无法欣赏或了解这些四重奏了”。

比起宏伟的交响音乐,弦乐四重奏显得纤巧。在音乐大潮中,它像涓涓细流,气势虽小,却可漫润到土壤的深处。四只乐器,形状由小而中至大,音色由清而浓至雅。琴弦上流泻的音符,与其说是来自于手指,不如说是来自于心灵。犹若呢喃的人声低语,它叙说着一个人内心的隐情与私絮。



□ 飞沿走笔

10万+算成果,儿童写的诗呢?

■ 张田勘

【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12月6日,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张东刚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网络文化成果能不能算科研成果”时表示,无论是论文、著作、普及读物,还是发展报告、咨询成果、网络成果,任何成果,不管在哪发表,只要有正能量,对人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用,都是好成果。评价应以内容为标准,不应以载体为标准。

这个回答如果代表的是教育部,说明有官方机构认可网上的10万+文章为成果,其要点在于,评价成果看内容不看载体。但是,对成果的认定还有一个重要标准,要有正面的促进、引领作用,也就是有用,或有意义。

以此为标准,可能难以衡量前些天网上广泛转发和传播的儿童(小学生)写的诗,这些诗早就突破了10万+,但是否有用,难以判断。即便如此,每位阅读到这些诗的人都可能会会心一笑,甚至引人回味思考。

一首《灯》的诗,要有多妙的想象和体验,才会说: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

一首《打仗》的诗写道,假如我/生活在战争的年代/别人冲在前线/我就只能在旁边/喊加油!

要有多新颖的视角才能表达出自田间所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的异曲同工之精髓: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还有《鱼汤》:我对鱼说/来吧/海岸上吧/辞掉你水中的工作/在旅游中升华自我/告别那水中的污浊/让天空净化你的魂魄/鱼对我说/如果我信了你的心灵鸡汤/今晚我就会变成鱼!

要有多深刻的思辨和生活体验才能达到与庄

子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的意境!这些只是能给予人一些精神思考和咀嚼的称为诗的三言两语能算成果吗?即便它们已经是100万+或1000万+了,可能也还不会被视为成果。原因也在于,这些诗有用吗?

很早的时候,罗素就对没有用的知识是否称为成果或学术踏踏,抓耳挠腮。他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境,这片无人之境就是哲学。”

这实际上指向了一个要素或硬性标准,一种精神产品是否有用。对于罗素的困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1939年发表《无用知识的用处》的文章中作了精妙的解答,他毫不犹豫地肯定,很多无用的精神产品也是成果和学术,更是学问和知识。

他说:“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须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作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进一步推而广之,从学术的起源和包罗万象来看,凡是通过独立思考,提出有见解、有价值的問題,即观点、主张、学说等,都可以算是学术,由此产生的无论是实际成果,还是理论假设,都是成果,也是成就,并且,无论这些精神产品是以网文还是以纸文发表。

所以,上述儿童发表的诗作应当保存下来。要记住,是以《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爸!看完这些孩子的诗,甘拜下风》为题,于2017年12月5日首发于《辽沈晚报》上的,全国多种和各路媒体疯转,早就达到1000万+了。将来,至少可以作为他们的早期成果用于申请大学、求职,或计入考评、晋级。

弦乐四重奏的『个人叙说』

李近朱

□ 气象万千

可可西里的天气和动植物

■ 林之光

【可可西里的所有植物都必须在大约100天时间内匆匆完成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籽甚至死亡的全过程。】

可可西里地区由于气候寒冷,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10℃,因此不能生长树木甚至灌木,植被类型属于高寒草原,连草也长不高,20厘米左右,形状也与低海拔地区草原不同,呈匍匐、垫状、丛生,或莲座(有点像倒扣的碗盆或碟状),叶面多缩小成刺,被毛,能够适应高寒、干燥、大风等极端气候。

可可西里地区草的覆盖度低,例如据西藏高寒草原,仅20%~50%,每公顷产鲜草量仅350~700千克。由于高原低温,植物生长十分缓慢,一旦破坏很难恢复。不过,也正由于低温,草叶呼吸作用弱,有利于有机质的积累,蛋白质含量高,适合高原动物生长需要。

可可西里漫长冬季中大地枯黄、积雪,但到了春天,大部地区也会出现一片淡淡的绿,有点“草色遥看近却无”那意思。到了夏天,草丛中更是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当地牧民称之为“五花草原”。尤其可可西里开花植物的花朵,相对茎叶而言,都特大,这也是典型的高山花卉特征。高原上紫外线特别强烈,花瓣的颜色特别丰富,且花型奇特,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属于我国珍贵的优良观赏植物资源。不过,开花期迟,花期短。据多次去可可西里生物考察研究的徐爱春博士估计,7月上半月是最佳观赏期。可可西里的所有植物都在大约100天时间内匆匆完成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籽甚至死亡的全过程。

可可西里最典型的动物有藏羚羊、藏棕熊、藏野驴和藏野牦牛等。藏羚羊号称“高原精灵”,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是可可西里的象征。以藏羚羊为原型的卡通动物“迎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它也是世界范围内受严格保护和禁止贸易的物种。

藏羚羊最为独特的行为,是雌性藏羚羊每年季节性千里远行,从周围地区到可可西里几个固定地产羔。世界上只有非洲大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也有万头集群大迁徙的行为,但那是为了季节性地获取食物和水,与藏羚羊为了繁殖产羔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但是雄性藏羚羊没有这种迁徙行为。它有两只尖端略弯的尖长的长角,因此被称为“长角羊”;但从侧面看,两只角可以完全重合,因此又奇怪地被称为“独角兽”。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藏羚羊开始遭

到大规模猎杀,主要是国外的盗猎者。据统计,在我国1999年开始大力打击盗猎分子之前,从20世纪80到90年代平均每年至少有2万只藏羚羊被猎杀。1998年青海省林业厅公布,可可西里藏羚羊已经不足2万只了。猖狂盗猎藏羚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种妇女奢侈品披肩叫“沙图什”。最早是印度北部新娘嫁妆之一,后来作为时尚传入欧洲。“沙图什”源自波斯语“Shahroosh”,意为“毛绒之王”。据说一条宽1米长2米的沙图什披肩仅重